

·人物与书林·

胡应麟: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奠基人

王嘉川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胡应麟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和研究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发展历程,初步确立起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基本格局,成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奠基人。

关键词: 胡应麟 图书事业 奠基人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2-0132-04

Hu Yinglin: Founder of Research on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Wang Jiachua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Abstract: On the career of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Hu Yinglin was the first scholar to make a fairly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umming up and study, which set up the basic research pattern of this field. It may be said that he was the founder of research on this field.

Key words: Hu Yinglin; book cause; founder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2-0132-04

胡应麟(1551-1602),明代中后期著名文献学家和私人藏书家,《经籍会通》就是他的代表著作。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图书事业史著作,也使胡应麟本人成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奠基人。但迄今为止,学界还尚未从图书事业史的角度对此书予以解析。故笔者撰文究其一二。

一 总结历代的图书收藏情况

通过对史志目录、官私书目的比较对勘,胡应麟发现,各家目录对图书的著录往往迥然不同。如隋朝官方记载的图书数量为三万七千卷,而《隋书·经籍志》则著录有八万九千余卷,唐八万二千卷,而《旧唐书·经籍志》云十二万五千余卷,“宋《崇文目》四万,《中兴目》五万,而《史》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对此,胡应麟在《经籍会通》卷一(以下引文出此者不再注明)指出:这一是由于“或但纪当时,或通志一代”,如史志目录为后人所修,是荟萃一代而成,而当时官私书目则只是记录一时或一人一地所有。二是由于“或因仍重复,或节略猥凡”,如《宋史·艺文志》主要因袭宋官修四部《国史·艺文志》,

但四志之间,有无增损,互有异同,编史者合此四志,虽做了一些删除重复的工作,终因史官无识,一书数见、重复颠倒之处甚多;再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虽以《七略》为本,但也对之做了一些增删损益的修订工作,因而虽二者时代相距不远,但所录图书数量却不无异同。

对这些“多寡悬绝”的纷繁杂载,“即博洽之流,勤于论核,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详”。有感于此,胡应麟旁参各代,细绎群言,核其讹谬,考其异同,对西汉、东汉、晋、东晋、东晋孝武、宋、齐永明、梁、梁普通、隋初、隋大业中、唐开元中、唐开成中、宋庆历中、宋淳熙中等十五个历史时期所存的典籍卷数详加考证,推寻出各时代的基本藏书情况。这就为后人研究图书事业发展史提供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整理的资料。对此,近代史家刘咸忻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古今藏书数目大略,胡氏《经籍会通》考之最详。”^{〔1〕}

二 考察历代的图籍兴废情况

早在隋朝,牛弘即已提出“书有五厄”之说。在此基础上,

胡应麟将历代书籍的散亡原因总为“十厄”，认为：“牛弘所论五厄，皆六代前事。……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大业一也，天宝二也，广明三也，靖康四也，嘉定五也。通前为十厄矣。”可见，“十厄”主要是指战乱兵燹。考察历史可知，这些战乱都已经关涉到各政权的兴衰存亡，图书“十厄”正是其在文化事业上的一种反映。因此胡应麟指出：“观此，则图籍废兴，大概关系国家气运，岂小小哉！”认识到国家政治形势对图书事业乃至文化事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几年以后，著名学者焦竑也在《国史经籍志·序》中表示：“运阻则铅槧息，治盛则典策兴。盖不独人主风尚系之，而世道亦往往以为候。”这显然是对胡应麟之论的肯定与认同。

不难看出，图书“十厄”是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出的，主要是续而不是创。但胡应麟绝非只是沿袭前人成说而无所发展之人，从他的全部学术活动考察，他总是博采前人之长而又出之以个人的创造性的批判审查。胡应麟沈湎典籍多年，掇拾补苴，窥管探研，对历代书籍的聚散情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总体看法：“等而论之，则古今书籍，盛聚之时，大厄之会，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汉也、萧梁也、隋文也、开元也、太和也、庆历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时也。祖龙也、新莽也、萧绎也、隋炀也、安史也、黄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会也。”至于东汉与西晋：“东京之季，纂辑无闻；魏晋之间，采摭未备；（董）卓（刘）曜诸凶，摧颓馀烬。于聚于厄，俱未足云。”这一分析，将古今书籍存亡聚散的大致发展过程，融入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交错相间的形式揭示出来，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勾勒了线索和脉络。

在以官方藏书为主，考察全国性典籍聚散之后，胡应麟在《经籍会通》卷一和卷四中，还对历朝历代私人藏书家的有关藏书状况作了历史考察，并纠正了前人记载中的夸大失实处。由此，胡应麟得到两点认识：一是，“大率人间所藏，卷轴不过三万（卷）”。当然，这是指删除重复的“正本”而言。这一点，即使聚书相当容易的两宋时期也是一样，“盖由印本易得，故储蓄者多，其数故不能溢也”；南宋陈振孙“所藏至五万馀，足为宋世藏书第一家；据《齐东野语》，乃宦中尽得五姓之书，故能至是，岂易易哉！”参以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这一数字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二是，藏书家于所藏“皆不能久有”。无论是受厄于人事之不藏的火灾，如叶梦得、李光、宋绶、晁文元等，还是受厄于藏弃者之鲜克有终，如宋人江元叔、元人庄蓼塘等，总之，“古今藏书，同一慨也”，即保存不易。胡应麟由此得到启示：“凡物，盛必有衰，聚必有散，即前代帝王、名公、钜儒，竭天下之力畜之，而一旦且散佚而不能保，则余今所得，庸讎可据为己物？”^{〔2〕}于是，他不但对自己的藏书室精心设计，使之“避湿”就日^{〔3〕}，防潮防蠹，而且还对藏书用途提出了

新的认识。

三 探讨藏书功用及藏书家类型

北宋时，苏轼明确提出了藏书的功用问题。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藏书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读，“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批评了当时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现象。显然，他所主张的“读”，是为了充实和提高个人的知识修养。相比之下，元代王恽的认识明显地更进一层，其《王氏藏书目序》云：“置之而不力其读，读之而不践其道，与无书等矣。”聚书之后，不但要努力去读，而且还要把读到的好的东西付诸自己的实践，成为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否则聚书与否，没什么两样。其后，马端临又从典籍流传的角度，来认识聚而必读的问题，其《文献通考·自序》云：“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有感于此，他在书中《经籍考·总序》之末，特别录载了苏轼的言论，“以警蓄书而不读者”。

作为一名藏书家，胡应麟接受了“聚书在读”的藏书目的论，明确宣称：“余则以书之为用，枕籍揽观。”^{〔4〕}他在《经籍会通》卷四表示：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富于问学、勤于钻研的学者。也就是说，他阅读藏书，既不是仅为提高个人才识修养，也并非为效法古圣先贤的所作所为，而是直接用以进行学术研究，这是他与前人在读书目的上的明显不同。在卷末，他录辑了欧阳修《集古录序》、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并特为申明此举说：“夫书好而弗力，犹亡好也，故录庐陵《集古序》。夫书聚而弗读，犹亡聚也，故录眉山《藏书记》。夫书好而聚，聚而必散，势也。曲士讳之，达人齐之，益愈见聚者之弗可亡读也，故录易安《金石志》终焉。”藏书散亡是必然的，只有读之用之，才是防止藏书散亡的最有效途径。既然已经将所藏图书的内容吸纳到自己的思想与研究、写作之中，其散亡又有何影响呢！

对于胡应麟本人的聚书读书，其长辈亦是其生平挚友的王世贞给予了极高评价。在他看来，只有像胡应麟这样，才是真聚书而又真读者！^{〔5〕}而遍览胡应麟的全部传世著述，无论是《少室山房笔丛》所收的十二种书，还是《少室山房类稿》中的史评、题跋、读书后、评史诗等篇章内容，以及《诗薮》二十卷，都是他在自己藏书的基础上，加以勤奋阅读之后写出来的。

藏书目的既已明确，对藏书家类型的讨论也即在情理之中。胡应麟说：“画家有赏鉴，有好事。藏书亦有二家。列架连窗，牙标锦轴，务为观美，触手如新，好事家类也。枕席经史，沈涵青衿，却扫闭关，蠹鱼岁月，赏鉴家类也。至收罗宋刻，一卷数金，列于图绘者，雅尚可耳，岂所谓藏书哉！”^{〔6〕}

对于藏书家类型的划分，当然是宋代以来私家藏书大兴的客观事实的必然要求。从胡应麟的论述来看，他是把宋人米芾关于画之收藏家的分类移植到对藏书家的分类。米芾在《画史·唐画》中说：“好事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货力，元非酷好，意作剽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

考察中国图书事业史可知，胡应麟是对藏书家类型进行分析论述的第一人。藏书家的出现是图书事业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因而对其加以分析把握，确实是一项积极、有意义的工作。胡应麟区分了好事家与赏鉴家，但这二者同属于为收藏而藏书，因此从评论家的角度说，他在思想认识上只是提出了一种藏书家类型。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胡应麟本人也是藏书家，而且是明代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他自己如何利用藏书，将自己定位于哪一类型的藏书家，是他从实践上对藏书家类型划分的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胡应麟并不欣赏收藏型的藏书家，他以自己的藏书实践，说明他是属于读书著述型的藏书家。从而，他实际上也就从认识与实践两个方面，划分了藏书家的两种不同类型，即收藏型和读书著述型。对于藏书家胡应麟来说，只有从其实践与认识两个方面把握他对藏书家类型划分的认识，才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的做法；仅注意他的言论而不考虑他本人的藏书实践，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胡应麟将收藏型藏书家区别为好事、赏鉴两种，说明在每一藏书家类型之下，还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进一步细分。在他之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一三中批评了三种藏书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者，谓之无书可也；二、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三、博学多识，记诵如流，但难以自运，与觚莫展者。很明显，这三种情况，正是胡应麟所说的好事家与赏鉴家；而从其所论第三种情况看来，谢肇淛也是肯定和赞同胡应麟的做法，主张和提倡能够将藏书自运于心的读书著述型藏书家。洪亮吉则在《北江诗话》卷三中，将藏书家分为考订、校讎、收藏、赏鉴、掠贩五种类型，但从宏观上说，考订、校讎都属于读书著述家，收藏、赏鉴都属于收藏家，掠贩则是既不读也不藏，只待善价而估的书贾，现代文学家唐弢就是如此分类的。^[7]而据钱曾《读书敏求记》之赵孟升《序》，钱谦益则径以读书之藏家、聚书之藏家为标目，并被现代文献学家余嘉锡所沿用。^[8]显然，无论是宏观的一般性分法，还是微观的具体细分，胡应麟的开创性工作都是不容抹煞的。

四 探讨图书形态的演变过程，肯定印刷术的发展进步

无论是历代藏书的发展，还是藏书家的大量涌现，从根本

上说都是图书数量和品种的发展壮大。此外，从图书外在表现形式上看，还有着自身形态发展的问题。对此，胡应麟考察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演变过程。他在《经籍会通》卷四说：“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书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简，冗重艰难，不可名状。秦汉以还，浸知钞录，楮墨之功，简约轻省，数倍前矣。然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里，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绌阅展舒，甚为烦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于漆书竹简，不但什百而且千万矣。土生三代后，此类未为不厚幸也。”这一论述，当然只是对书籍自身形态演进过程的纲要式说明，其真实演进过程远比这复杂得多，但就其演进过程整体看，胡应麟所述还是揭示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几个主要阶段，并对这一过程中由简牍到造纸术再到印刷术的科技进步，鲜明地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此前，陆深在《金台纪闻》第20条中，对印刷术的发展进步给予了否定。胡应麟对陆深很有研究，陆深的这一观点，他当然知道，因此，他对印刷术发展进步的肯定，正是对陆深落后认识的直接批判。就此，他还专门考证了雕版印刷的历史，指出：“遍综前论，则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参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9]这一总结“综合”，特别是雕版始于隋之说，后人虽亦有质疑者，但越来越得到了现代学者的认同和肯定。如张舜徽据考古文物资料指出：“我国远在六世纪末，已有雕版印刷书。”^[10]宋原放等人认为：“雕版印刷术发明发展的完整而清晰的过程，就是‘创于隋唐，广于唐末，盛于五代之后’。”^[11]肖东发则更为直接地指出：“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雕本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清代以来，赞成此说者越来越多。”他认为：“在肯定我国唐代初年已有雕版印刷品流行的前提下，亦不能完全否认隋代出现雕版印刷术的可能。……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时间是6-7世纪之交，应该成为共识。”并从雕板印刷术产生的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断言：“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至初唐之际。”^[12]

五 考察明朝当代的图书事业情况

在《经籍会通》卷四中胡氏对明代的图书事业情况进行了考察，涉及到当时的图书出版盛况、各地的书肆情况、书籍的刻板情况、各地印书的纸张情况等诸多内容，因篇幅所限，这里仅择要介绍一二。

关于图书出版盛况，胡应麟总结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

至十万。……今欲购书,又差易于宋。何也?经则一十三家注疏,递梓于诸方,史则二十一代,类颁于太学,合之便可三千餘卷;宋初诸大类书,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南渡类书十餘,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则不啻万卷矣。释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数百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说诸家,合之又不下万卷矣。”其他如先秦、盛唐、宋世诸书,大约数百家;再加上所谓的经之闰者、史之支者、子之胜者、集之副者,又无虑数百家,“悉世所恒有,好而且力,则无弗至也”。胡应麟恰恰是好而无力,所以他也只能常常因购书不得而怅惋弥月。当然,也并非所有书籍都可力致。他以藏书家特有之识力,指出了数端“极难致”的情况,并云:“必多方笃好,庶几逢之,不然,货钜程、陶,权压梁、窦,他可力强,此未易云。”这当是他自己三十年间访书、求书的经验之论。

作为一名夙有书癖但无财力的藏书家,胡应麟对当时的书值标准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前五者是刊印以后书籍本身的客观情况,后二者是购书人的主观情况。只有将客体与主体两方面的情况统一考察,才能确定书值的等差标准。然后,他分别论述了本、刻、印、装等客体的等差类型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补依存关系,如本,单从版本上说,有刻本、钞本与宋本之分,“刻者十不当钞一,钞者十不当宋一”,然而刻本与刻本之间、钞本与钞本之间、宋本与宋本之间,也还存在着价值“自相较”的问题,这就需要考察其他因素:“则又以精粗、久近、纸之美恶、用之缓急为差。”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有装、印、纸、刻绝精,而十不当凡本一者,则不适于用或用而不适于时也;有摧残断裂而直倍于全者,有模糊湮灭而价增于善者,必代之所无与地之远也。”可见,在书值等差标准问题上,胡应麟是强调对各种主客体因素的综合考察。很明显,这种综合确定书价标准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对现在的图书出版事业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胡应麟对当时图书事业情况的总结记述,为后人研究明代图书事业史提供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清人叶德辉《书林余话》记载有关明代刻书之事三十余条,其中仅有一条不是采自胡应麟的记述。现代史学家黄云眉撰《明史考证》,则特地附录其所记两都、吴、越各地书肆及吴、越、闽、蜀等地版本情况,认为此乃“古籍掌故所系”,“当时各地印刷业、造纸业之大概,已可于所记得之”,并明确指出:胡应麟“能以南北购书长期涉历所得,告之后人如附录云云,则诚足珍视。”

[13] 而当今学界也径称之为明代“最留心此事”者,[14] 极大的

肯定了他的保存资料之功。

六 结语

综上所述,胡应麟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总结了历代的图书收藏情况,并特别考察了历代图书的聚散情况;鉴于宋代以来私人藏书家大兴的事实,他探讨了藏书功用,提出了聚而必读才是防止藏书聚而必散的最有效途径的认识,并率先划分了藏书家的类型;他简要梳理了书籍由漆文竹简进化为书册的形态演变过程,肯定了印刷术的发展进步,并对明朝当代的图书事业情况进行了多方考察。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胡应麟探讨和总结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体系。他的研究探索,不但初步确立起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为后世研究图书事业史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洵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研究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 [1] 刘咸.目录学·存佚第ㄟ A].推十书 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1732.
- [2] 胡应麟.二酉山房书目序·三少室山房类稿 卷八[M].续金华丛书本.
- [3] 胡应麟.经籍会通·少室山房笔丛 卷二[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33,24.
- [4] 胡应麟.二酉山房记·少室山房类稿 卷九 [M].续金华丛书本.
- [5] 王嘉川.胡应麟生平考略 J].图书与情报,2005,(3):90-93.
- [6][9] 胡应麟.经籍会通·少室山房笔丛 卷四[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62,60.
- [7] 唐弢.藏书家 A].晦庵书话 M].北京:三联书店,1998:392.
- [8]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 M].长沙:岳麓书社,1997:537.
- [10] 张舜徽.居易录·清人笔记条辨 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
- [11] 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 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49.
- [12] 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4-46.
- [13] 黄云眉.明史考证 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67-2269.
- [14] 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 J].文史 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127-158.

作者简介:王嘉川(1971-),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